

移动网络时代“复合空间”生成的层级要素 及其耦合逻辑

蒋晓丽 朱亚希

【摘要】当下,“复合空间”业已成为理解和把握移动网络时代媒介化社会空间的关键术语,然而学界更多的是将之作为描述性概念使用,对其生成背后的内在逻辑鲜有探寻。本文强调,“复合空间”并非是简单由技术建构的、仅涵括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不断融合的社会现实,而是基于“工具/移动界面”、“主体/身体(‘人机复合体’)”、“关系/社会交往”三个“层级/要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在此基础上,三者通过移动性这一关联逻辑耦合起来,处于立体的、动态的、不可分割的相互连结之中,最终构成作为有机整体的“复合空间”。

【关键词】移动互联网;复合空间;移动界面;人机复合体;社会交往

一、引言:“复合空间”成为理解移动网络时代媒介化社会空间的关键概念

近年来,整合了移动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移动互联网发展势头迅猛,开始逐渐取代以PC为代表的传统互联网,成为当下网络社会中最具颠覆性的技术形态,深度嵌入至人们的日常交往与社会互动。不同于传统互联网时代,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被视作是割裂的、不连续的两种社会空间形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人们身处的已然是由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不断交织与融合而生成的新型媒介化社会空间。也就是说,当下日渐成熟的移动网络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过去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实现了二者间的重组、互嵌、深度连结与整合。在本文中,我们将移动网络时代下的这种虚实混杂互嵌的新型媒介化社会空间称作“复合空间”(hybrid space)。

目前,“复合空间”这一概念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工程学、城市建筑学、计算机科学、教育学、传播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各个学科领域。仅从传播学这一学科来看,近年来中西方学者尝试从不同研究路径理解和把握“复合空间”这一移动网络时代下的关键概念。面对空间不断再移动与混融的社会现实,巴西裔美国学者席瓦尔(Adriana de Souza e Silva)较早以“复合空间”这一概念清楚地论述了从

蒋晓丽,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成都 610064);朱亚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成都 61006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传统媒体与新型媒体融合发展研究”(15AXW002)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数字时代城市空间中的移动聆听文化与传播实践”(201217jjsy130)的研究成果。

“赛博空间”到“复合空间”的历史发展,并在两者之间做出了关键性的概念区分。用Silva自己的话来说:“当虚拟社群(聊天室、多用户领域、多人角色扮演线上游戏等),那些之前所谓数字空间的活动因移动界面的使用而移往实体(物理)空间时,便产生了所谓的复合空间。”^①他同时进一步指出,“复合空间”就本质而言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混合现实”(mixed reality)、“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增强虚拟”(augmented virtuality)或“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等概念,它的出现是对重新定义物理空间和“赛博空间”的一种全新尝试,正如他所说:“复合空间的出现,是为了填补当互联网变得移动和以前在网络空间中形成的社区可以在城市(混合)空间中被发现时的空白。”^②随后,Silva将“复合空间”这一概念运用到混合现实游戏的研究之中,他通过移动性(mobility)、社交性(sociability)和空间性(spatiality)三个主要特征,将“混合现实”(hybrid reality)和基于位置的移动游戏(location-based mobile games)进行重新概念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来分析这些游戏。^③2016年,Silva再次以谷歌旗下的尼阿特游戏公司(Niantic Labs)发布的“增强现实游戏”“Pokémon Go”作为分析个案,着重探讨当这类游戏成为主流时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和空间问题。^④从国内来看,以复旦大学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围绕“复合空间”展开了诸多面向的讨论。比如孙玮认为,移动网络时代的城市体验使得人的身体、感官不断地在实体、虚拟空间中来回穿梭、反复切换,以至于人们很难在体验层面将二者截然区分开来,它是融合了虚实的“复合空间”。^⑤同时,她指出,移动网络时代技术具身的“赛博人”作为一种新型传播主体,其传播实践打通了实体与虚拟这两个原本隔绝的社会系统,实现了实体空间网络和虚拟信息网络的融合,“复合空间”由此诞生。^⑥许同文从媒介与空间融合的角度出发考察发现,位置媒体(locative media)作为一种具身的空间生产技术,体现了媒介技术与城市空间的深度融合,形塑了一种新型“复合空间”。同时,位置媒体作为空间的一种“流动力”,使城市“复合空间”成为了一种新型“流动空间”。^⑦

承上所述,不难发现,虽然“复合空间”业已成为当下理解和把握移动网络时代媒介化社会空间的关键术语,然而学界更多的是将其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使用,以此涵括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不断互嵌与融合的媒介社会现实,对其生成背后的内在逻辑却鲜有深入细致地探究与总结,由此,也引发了我们一系列的疑问和思考:“复合空间”只是简单由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叠加生成的吗?“复合空间”的生成是否只是单纯地基于媒介逻辑?带着上述疑问,本文旨在探讨和解决以下两个问题:其一,移动网络时代“复合空间”生成背后所包含的“层级/要素”是什么?其二,这些“层级/要素”之间又是通过何种关联逻辑进一步耦合起来?它们彼此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二、移动网络时代“复合空间”生成的层级要素

从空间视角来考察分析人类自诞生以来的媒介技术发展传播活动演进就可发现,人类一直都在利用各种媒介手段拓展自身生存的社会空间,或者说,人类在通过媒介而拓展和再造的社会空间

①A. D. S. E. Silva, “From cyber to hybrid mobile technologies as interfaces of hybrid space”, *Space & Culture*, vol.9, 2006, pp. 261—278.

②A. D. S. E. Silva, “From cyber to hybrid mobile technologies as interfaces of hybrid space”.

③A. D. S. E. Silva, “Hybrid reality and location-based gaming: redefining mobility and game space in urban environments”, *Simulation & Gaming*, vol.40, 2009, pp. 404—424.

④A. D. S. E. Silva, “Pokémon Go as an HRC: Mobility, sociability, and surveillance in hybrid space”,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vol.5, 2016, pp. 20—23.

⑤孙玮:《从再现到体验——移动网络时代的传播与城市文脉保护》,《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9期。

⑥孙玮:《赛博人: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新闻记者》2018年第6期。

⑦许同文:《位置即讯息:位置媒体与城市空间的融合》,《新闻记者》2018年第6期。

中展开社会生活。循此,移动网络时代“复合空间”的生成理所当然地也被认为是基于媒介技术建构而成。然而,事实绝非如此简单,“复合空间”既不是简单地由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叠加而成,也不是单纯地由媒介逻辑建构而成,而是在多种“层级/要素”共同作用之下生成的结果。接下来,本文将对“复合空间”生成背后所包含的各个关键“层级/要素”展开详细梳理。

(一) 工具层/移动界面

有学者指出:“迄今为止,我们尚无法用一个统一的框架和范式来概括所谓新媒体时代的所有内涵,只能通过其不同面向不断揣测和逼近这个时代的本质。而在这所有的面向中,‘界面’无疑是最关键的。”^①诚如这位学者所言,近年来,“伴随着社会学者和媒介学者致力于探查人类和机器、硬件(包括身体)和软件之间、物质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复杂而迅速变化的关系,‘界面’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正在不断上升”^②。

何谓“界面”(interface)?《现代汉语词典》将“界面”定义为物体与物体之间的接触面。《牛津在线词典》给出“界面”的两个分支界定:一是指两件电子设备之间的连接,或人与计算机之间的连接物;二是指两种事物相互影响或相互影响的情况、方式或场所。在文化研究学者迈克尔·海姆(Michael Heim)看来:“‘界面’就是两种或多种信息源面对面的交汇之处。”^③

事实上,“界面”一词被用于信息交流的传受过程并非今日之新鲜事,而是古已有之。早在古希腊时期,古希腊语“prosopon”一词便有“界面”、“面具”之意。“古希腊人传说着‘prosopon’,即两张面对面的脸。两张相对的脸构成相互关系。一张脸对另一张脸做出反应,另一种脸则对前者的反应做出反应,而前者则再对另一张脸的那个反应再做出反应,如此反复,以至无穷。这个活动就是信息交流的传受过程。”^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虽然没有“界面”一词,但却有相似的概念。“无论是玉琮上的神兽,还是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样,对上古人们来说同样是神圣且令人敬畏的,都在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中起着‘界面’的作用。”^⑤诸如此类的还包括基于身体界面的原始乐舞、基于语言界面的知识传播,等等。可以说,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绝大多数活动都需要借助“界面”来完成。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界面”作为一个重要概念范畴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即便是在上世纪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崛起之后,麦克卢汉把电视称为“触觉”(指各种感觉的总和)媒介,认为“电子感官使人们重新体验部落文化中村庄式的接触交往,接触电视需要人们积极的感觉上的参与,这种参与是有接触感觉的”^⑥,那个时候他都仍未用“界面”这一概念对传播活动的规律和特点加以阐释。

“界面”的重要性真正得到凸显得益于上世纪中期计算机的发明。随着计算机的出现,“人机互动”(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HCI)开始成为一种人与机器进行沟通、展开互动的显著方式。在此情形下,“界面”成为人操作技术的平台,“人对机器发出一系列指令,这些指令会激发机器自身的机制,进而让机器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框架有效地完成相应的功能”^⑦。自此,“界面”成为了人与计算机之间重要中介物,被冠以“人机界面”的称呼。亦如波斯特(Mark Poster)所说:“人机界面”是“介于人类与机器之间的一类‘隔膜’(membrane),使相互排斥而又相互依存的两个世界彼此分离而又相

① 祁林:《界面文化研究:主持人语》,《文化研究》2015年第23辑。

② [美]尼古拉斯·盖思、[英]戴维·比尔:《新媒体:关键概念》,刘君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页。

③ [美]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金吾伦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8页。

④ 陈月华、王妍:《传播美学视野中的界面与身体》,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引言第1页。

⑤ 陈月华、王妍:《传播美学视野中的界面与身体》,引言第1页。

⑥ 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5页。

⑦ 祁林:《界面革命》,《文化研究》2015年第23辑。

连。”^①

当下,人类社会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正在加速向信息社会进化。随着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可穿戴式设备为代表的移动媒介的发明和移动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界面”开始呈现出移动化的属性,演变成为“移动界面”。区别于传统网络时代“固定”于某一地点的“人机界面”,“移动界面”具备了以下两个特点:其一,“具有微型化特征的”“移动界面”非常适合人们随身携带,因此,它们“近乎完美地存在于日常生活空间和场所之中”^②。其二,具备可穿戴性(wearability)、可携性(portable)、移动性等特质的“移动界面”进一步打破了过去“固定”与“移动”、“肉身在场”与“虚拟在场”、“公共”与“私人”之间存在的固定界限,随着“移动界面”的普遍使用,这些过去看似明确的“边界”如今也变得移动、不确定甚至是难以界定了。循此,人们在“移动界面”的中介与延伸中,不再单纯地处在某个“固定”的场景之中,而是处于一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移动场景”之中。更进一步说,藉由“移动界面”的使用,实体与虚拟的当下在某种程度上被混杂嵌合了起来,人们由此进入到一个基于“移动界面”所创造的新型“复合空间”之中。

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几位学者的观点对上述说法加以补充。美国学者威廉姆·米歇尔(William J. Mitchell)将“移动界面”描述为一种整合进入城市空间的物理和信息(基础)结构的人工材料(prosthesis),正如他在代表作《Me ++: The cyborg self and the networked city》一书中开篇便写道:“我手中拿着一套廉价的发射器(transmitter)和接收器(receiver),它比马可尼的巨大结构更加复杂,它可以让我时刻与全世界成千上万的类似的装置相连接……我现在所持有的这个装置界面成为了我移动身体的一个自由地延伸。”^③在Mitchell看来,借助“移动界面”,能够让我们置身于物理环境之中并“实现持续的电子化参与”^④。在此基础上,“移动界面”将肉身所在的物理空间与藉由数字信息技术所构建起来的虚拟空间进行了有机的融合,并将行动者身体、物质环境和信息化环境交织在一起。与Mitchell想法大体一致的还包括尼古拉斯·盖恩(Nicholas Gane)、戴维·比尔(David Beer)和Silva等学者,他们一致认为,“移动界面”在日常生活中的日益普及并不意味着它“将生活从其所在的环境中抽离出来——即所谓的地理理论的终结——而是说它们以新的方式使得我们与具体的空间紧密结合”^⑤,更进一步说,“基于移动界面驱动下的从虚拟空间到复合空间的这一转变让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数字从未真正与物理分离,相反,数字技术可以成为促进城市空间社交和传播的一个最重要元素”^⑥。

由此,不难看出,移动网络时代“复合空间”生成的第一个也是最基础的要素便是移动媒介,更准确地说,是基于移动媒介的“移动界面”广泛嵌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场景之中。因此,“移动界面”也构成了“复合空间”生成的第一个层级——工具层。

(二) 主体层/身体(“人机复合体”)

人类从诞生之日起,身体除了作为一种生物性的物质结构,还是人类精神生活和思想的重要载体,是社会与文化的基本单位,对于社会系统的形成与维护来说至关重要。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身体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和研究领域,一直处在一个被遮蔽、被忽略以及被管束的客体角色,或者借用克里斯·希林(Chris Shilling)的话说:“身体是一项可有可无的学术兴趣。”^⑦

① [美] 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页。

② [美] 尼古拉斯·盖恩、[英] 戴维·比尔:《新媒介:关键概念》,第61页。

③ W. J. Mitchell, *Me ++: The Cyborg Self and the Networked Cit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3, pp. 1—2.

④ W. J. Mitchell, *Me ++: The Cyborg Self and the Networked City*, p. 2.

⑤ [美] 尼古拉斯·盖恩、[英] 戴维·比尔:《新媒介:关键概念》,第59页。

⑥ A. D. S. E. Silva, “From cyber to hybrid mobile technologies as interfaces of hybrid space”, *Space & Culture*, vol.9, 2006, p. 274.

⑦ [英] 克里斯·希林:《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学术研究中对身体忽视,在某种程度上也波及和影响到了传播学,以致在主流传播学研究中,身体形同虚设,甚至成为一种需要被克服的障碍,这从20世纪电子媒介和计算机的应用中便可窥一二。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电子媒介的普及使得人类的感官不断膨胀,日益外化,甚至是“离体”而出,用戴维·申克(David Shenk)的话便是,电子媒介“将人脑加速到一个异乎寻常的速度,而人的肉体却原地不动。这一形成的鸿沟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人的大脑被赋予了能够浮出肉体、进入电子虚空的能力”^①。媒介理论大师麦克卢汉曾警醒过我们,在使用电子媒介时要格外注意精神可能会离开肉身,正是因为,当我们在听收音机或者看电视时,我们的肉身之于时空的活动是没有意义的,甚至社会个体的身体是“剥离了‘身体’整体感觉的、单纯依赖经过中介的视觉、听觉而传播的”^②。正因如此,麦克卢汉形象地将电子时代的“芸芸众生”称作脱离肉身的“无形无象之人”(discarnate man)。^③随着媒介技术继续向前演进,传统互联网技术建构起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虚拟世界”,这其中,麦克卢汉此前所谓的“无形无象之人”继续存在。也就是说,与此前的电子媒介技术一样,传统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决定了人们必须“固着”于某地并且抛弃身体这一重要的主体性元素,才能进入到“虚拟世界”。换言之,只有当人们坐在电脑前时,才能全神贯注地投入“荧幕”之中,而此时,身体处于完全“消失”的状态。法国学者保罗·维瑞里奥(Paul Virilio)因此断言:“当人们坐在当下盛行的电脑这一‘身体终端机’(body terminal)面前时,也就意味着‘身体’的终结(termination)。”^④

当下,随着移动互联网开始取代传统互联网,凭借着“移动界面”随身携带、即刻连结的科技特性,身体这个在电子媒介时代和传统互联网时代长期被遮蔽甚至是消失的重要元素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也就是说,随着如今移动网络技术和“移动界面”的遍在性,人们不再需要牺牲自己的身体,只需借助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媒介,所谓的“荧幕”就被放入口袋中,并随着身体自由移动、穿梭。显然,移动互联网技术和“移动界面”解放了曾经看似必须“固着”于某地的身体。或者借用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更为形象的说法:“如今‘保持联系’已经不需要以身处插座附近为代价,在公车上、街道旁、公园里、咖啡厅,我们随时都能够‘在线’。”^⑤总之,身体的回归不仅意味着将很长一段时间在媒介研究中被忽视的“地理”元素被再次带回至传播学者的视野,也预示着过去身体必须固着在某一个特定的地点(或许声音媒介是个例外)才能接触和使用媒介的预设正式瓦解。

身体这一长期被忽视的重要元素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全面回归已是不容争议的事实,然而,“复合空间”的生成绝非身体回归这么简单。事实上,技术与身体的嵌合,或者说,技术具身的身体才是“复合空间”生成的最重要的主体性要素。

技术具身的身体是一种区别于“肉身化”的身体,它是技术介入身体之后所重构的一个“技术态身体”,也被一些学者称之为“人机复合体”、“赛博人”、“赛博格”(下文将统一采用“人机复合体”)。“人机复合体”之于身体维度而言体现为两大主要特征——技术的身体化和身体的技术化:

首先是技术的身体化。在移动网络时代,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形态重构了人们的身体并成为人的身体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透过媒介技术经验世界、建立真实的过程中,身体成为了媒介技术的延伸场域,而媒介技术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比如,若将“移动界面”视作“身体与机械系统汇聚的联系之处”,那么,“移动界面”所呈现出的特点之一即是“与人须臾不离,是人的身体的组成部分。它不是人体的延伸,也不是延伸的‘人体’,而是人体或者人体的‘器官’——代具”^⑥。

① [美]戴维·申克:《信息烟尘:在信息爆炸中求生存》,黄锦坚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② 孙玮:《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学术月刊》2015年第12期。

③ [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82页。

④ P. Virilio, *Open Sky*, London: Verso, 1997, p. 11.

⑤ [英]齐格蒙特·鲍曼:《液态之爱:论人际纽带的脆弱》,何定照等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07年,第127页。

⑥ 黄旦:《千手观音:数字革命与中国场景》,《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1期。

其次是身体的技术化。有学者认为,“人机复合体”作为移动网络时代的新型传播主体,其出现使得“媒介不再是外在于人的一个工具或者机构,而是转为身体本身”^①。也就是说,身体透过技术的嵌入和使用在某种场合下被“工具化”,并作为与环境互动时的一种新的“交互界面”。正如丹麦学者克劳斯·布鲁恩·延森(Klaus Bruhn Jensen)所言:“……交互界面的基本意涵发生了变化,它从一种工具的界面变成了一种皮肤或者生物膜的界面,即‘有机用户界面’。”^②显然,延森所谓的“有机用户界面”正是指我们所论及的“人机复合体”之身体。

不管是技术成为身体的一个部分,还是技术具身的身体作为一种工具(“交互界面”),它们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创造出了一种新型“复合空间”。这是因为,由“人机复合体”所造就的“交互界面”成为了连结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索引”(index)。当实体化的身体一旦与数字装置相连结,身体即刻就像是鼠标、键盘等信息输入装置,可以即时地利用身体动作(如手势、姿态等)对数字装置输入指令或信息。藉此,实体化身体具有了直接与虚拟空间进行对话与沟通的能力。而这时,身体所处的物理空间便和虚拟空间交织并融合在一起。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赛博人身体的二重性,使得这个技术叠加生物体的界面,能够打破实体社会网络与虚拟信息网络的屏障,即时性地穿越在分属不同网络中的各种系统中,并且通过个体的传播实践,实施个人化的重新组合。”^③

综上,我们认为,“复合空间”生成的第二个重要“层级/要素”便是主体层中的技术具身化的身体。

(三) 关系层/社会交往

“复合空间”生成的第三层级要素是基于“移动界面”和“人机复合体”基础之上的新型社会交往实践。一般而言,社会交往是指人与人之间产生的互动与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这种互动与交流既包括物质层面,也涵盖精神层面。从宏观角度而言,社会历史演变就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人的社会交往形式的演变,这是因为“人们的交往活动离不开一定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背景话语,同时,人们在交往中又创造着适合新的更高的生产力和更适合于人的自主活动的交往形式”^④。从微观角度来看,社会交往是人的本质的内在要求,也是人的社会存在方式。人作为一直社会化的存在,相互之间是具有本质连接的。

社会交往一般需要借助某种特定的交往手段,而交往手段作为交往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主要包括语言、传播手段、运输工具和货币等四个方面。^⑤本文侧重于从传播手段这一层面来展开论述。众所周知,人类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这四个主要阶段。其中,每个传播阶段由于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的不同,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也形态各异,在此基础上所生成的媒介化社会空间形式亦有所不同。

比如在口语传播时代,人类社会主要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社会交往并组织起来的,也就是说,语言是当时人们进行传播与交往的最主要媒介形式。众所周知,语言是一种基于声音的沟通媒介,通过语言所塑造的是一个协调各种感官的“音响空间”(acoustic space),这正是口语传播时代中的主要媒介化社会空间形式,正如麦克卢汉所言:“直到书写发明之前,我们都生活在音响空间之中,那是爱斯基摩人现在所生活的空间:无边界、无方向、无地平线,心之黑暗,感情的世界、原初的直觉、恐怖。在这

①孙玮:《赛博人: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

②[丹]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6—87页。

③孙玮:《赛博人: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

④范宝舟:《论马克思交往理论及其当代意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06页。

⑤王武召:《社会交往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前言第1页。

个黑暗的沼泽之中,口语乃是社会宪章。”^①基于语言传播所形塑的“音响空间”中的社会交往具有以下几个特质:首先,由于人类的生理限制和传播手段的限制,决定了语言传播只能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这就导致了在以语言为基础的“音响空间”中,人们更容易实现社会群体间的有机团结。从社会学意义而言,这种“音响空间”类似于麦克卢汉所说的“部落化社会”这一社会空间组织形式。其次,由于语言和声音这一媒介是稍纵即逝的,这就决定了在语言所构建起的“音响空间”中,人们不仅仅要靠嘴巴和声音传达信息,同时也需要人们的身体在场,以及强调人们身体语言的高度配合。可以说,口语传播时代下人们彼此之间的身体接触方式是亲密无间的,身体团结与人们基于共同身体的社会团结高度一致,正如有学者指出:“口语和身体的同一,强调参与和身体的在场,使人得以为人,使人组成关系密切的群体。”^②

又如,在文字印刷传播时代,不管是文字的发明,还是印刷技术的应用,书面传播时代文字印刷媒介构建起了一种不同于口语传播时代“音响空间”的全新媒介化社会空间——以视觉为主导的“视觉空间”。区别于“音响空间”,“视觉空间”中的社会交往有了一些新的特质:其一,以文字为基础所构建起的“视觉空间”带有强烈的私人化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文字是一种抽象化的符号,上升到了更高意义的抽象层次,使得人们阅读和写作必须在一个较为封闭的私人环境下专注地进行,因此也导致了某种程度上社会关系的隔离与疏远。其二,基于文字为基础的传播和交往行为,是一种具有滞后性特征的社会交往。有学者指出,“书面传播是一种典型的旁观式参与,虽然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但双方的反应都是时间滞后的,也不能看到除文字之外的对方的表情、动作、姿势等其他交流信息,人们只能通过想象一种虚拟的对话情境,这使得互动都是虚拟化的”。^③

到了传统互联网时代,计算机技术建构起了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应的基于网络化和数字化的“虚拟世界”,由于这二者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也就使得人们的社会交往只能局限于某一空间,而不能将其很好地耦合起来。除此以外,不确定的身体是否“在场”也是传统互联网时代社会交往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们更愿意选择身体“不在场”,或者说,身体“虚拟在场”的交往方式,这种不确定的身体属性催生了人们之间新的社会交往方式,即没有直接地身体接触或相遇,人们依然可以借助网络技术进行沟通,瞬间形成深层次的沟通与互动。由于传统互联网时代人们脱离了“肉身”而进入虚拟空间,物理和虚拟空间之间必然存在明显的“边界”。

今天,移动网络技术建构了一种全新的媒介交往场景,在此场景之下的社会交往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融合。也就是说,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与普及,除了加强了传统大众媒介和网络媒介的那些原有功能,还以新型连接形式,生产出了一种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混杂互嵌的崭新移动场景及社会关系,使得人们竭力寻找的线上传播和线下行为的连接点,或者说实现在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之间的穿梭和两种空间汇聚至此的并置。^④此外,身体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有了更灵活的选择,身体既可以“在场”,也可以“不在场”,处于一种极具“弹性”的状态。比如,有学者在对微信这款新媒体产品考察后发现,日常生活中微信使用就是一种结合“肉身在场”与“虚拟在场”的媒介使用行为。实体空间的“在场”会被用户以各种虚拟方式呈现在其微信群或朋友圈之上,同时,用户与微信群或朋友圈点赞的好友展开即时互动。^⑤另外,当下基于各种“移动界面”的“每日签到”、“跑步打卡”、“添加地点”等功能也是很好的案例。比如,以跑步运动类APP为例,社会

①林志明:《影像与传播——阅读麦克卢汉》,《师大学报:人文与社会科学类》(中国台湾)2002年第1期。

②马向阳:《纯粹关系:网络分享时代的社会交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8页。

③马向阳:《纯粹关系:网络分享时代的社会交往》,第58页。

④孙玮:《城市传播:地理媒介、时空重组与社会生活》,孙玮主编:《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七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7页。

⑤孙玮:《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学术月刊》2015年第12期。

个体可以利用“移动界面”所赋予的定位追踪功能为其记录跑步路线。有时为了更好地进行自我展示和形象建构,社会个体往往还会有意识地利用运动轨迹绘制不同的艺术图案,使轨迹记录活动发展为基于虚拟地点的艺术实践。^①然后,藉由“移动界面”上的分享功能,社会个体将在实体空间的“在场”呈现在其自我构建的虚拟空间之中,并通过与线上好友展开实时互动(评论、点赞),重塑和他人之间的新型社会交往关系。

总而言之,在移动网络时代所涌现出的基于“移动界面”和身体基础之上的新型社会交往实践激发和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的交往场景。这种媒介场景的重构,实现了人们在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之间的穿梭和并置。

三、移动性:复合空间各层级要素耦合的关键逻辑

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在他的《超越社会的社会学》一书中曾论述了“物质转型如何重塑社会”这一问题。就那些物质转型而论,Urry所能联想到的是想象的旅行移动(imaginative travel)、图像和信息的移动(movements of images and information)、物理与虚拟的移动(virtuality and physical)以及将“社会即社会”(social as social)重构成“社会即移动”(social as mobility)。^②不难看出,在Urry眼中,移动性构成了社会。除Urry以外,当代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其代表作《流动的现代社会》一书中,也曾向我们展示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的以及持续改变的样态,并尝试说明现代社会正在从“固着的”现代性到“流动的”现代性转变。可以说,“移动性”不仅成为了公认的当代社会与文化特质和世界开展的关键性要素,也成为了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与核心价值。正如彼得·艾迪(Peter Adey)在其《移动》一书开篇就讲道:“移动性无所不在,它是我们几乎无时无刻都在从事和经验的東西。”^③

事实上,移动性作为当代社会展开和运行的关键要素,其意义的凸显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我们有机地串联起“复合空间”生成的三个“层级/要素”提供了一种思路和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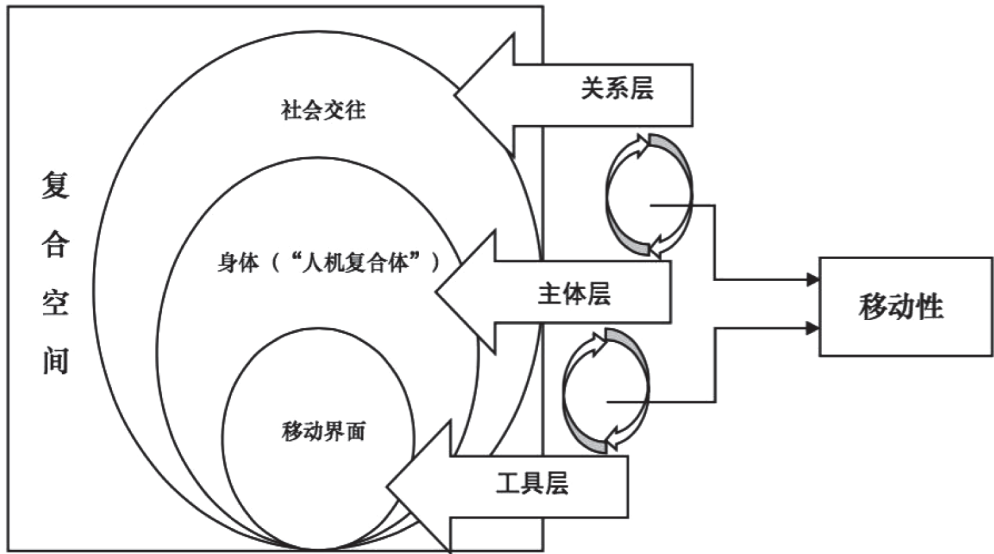


图1 “复合空间”的各“层级/要素”及其耦合逻辑示意图

①李森:《空间、地点与定位媒介:移动新媒体实践中的城市空间再造》,《西部学刊》2018年第8期。
②J.Urry,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00, p. 2.
③[美]彼得·艾迪:《移动》,徐苔玲、王志弘译,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第1页。

首先,从工具层面来看,“移动界面”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重组和超越。众所周知,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生活展开的两个最基本的维度,然而,在过去不可移动的时代下,时间和空间就传播层面而言是分离和割裂的。在大众传播时代,“用时间消灭空间”被认为是现代传播的理念与信条,“通过信息速度是不断扩大的社会空间逐步联系到一体,使彼此间各自存在、互不往来的聚落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网络”^①。到了传统互联网时代,“空间消灭时间”成为一种新型时空模式,亦即“在有限的时间内,人类的空间得到无限的延展,媒体需要通过对具体的空间场景提供定制化的信息供应,来试图抢夺人们在每一个时间节点中的媒介使用”^②。然而,不管是“时间消灭空间”还是“空间消灭时间”,折射出的都是时空关系在传播层面的截然分离。随着移动网络时代的到来,传播媒介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移动性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众多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关系,比如固定与移动、真实与虚拟、私人与公共等等。在此基础上,移动媒介带来了时空关系的重新组合和超越,特别是藉由“移动界面”所建构和创造出的新型“移动场景”,使得人们能够同时置身于多个场景之中,不同场景随着人们的移动实现融合与交织。“这种穿梭于多种场景中的移动是高度动态性的,很少有绝对静止稳定的时刻。这样的新型场景展示的是多种场景并置、多重关系同时展开的时空关系。”^③

其次,从工具层和主体层的耦合来看,基于移动性的“移动界面”在实现时空关系重组的同时,也实现了传播与身体在连接上的超时空性。我们知道,人的身体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是依赖时间和空间而存在着的。换言之,时间与空间之于人的身体而言具有不可分割性。“移动界面”所带来的时间和空间关系的重组和超越,使得时空关系与社会个体之身体的关系在传播意义上发生了一致性的变化,这在此前以线性逻辑为主导的大众传播时代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在移动性的影响之下以及在经由“移动界面”所创造的新时空场景之中,身体不再是过去传播活动中那个被遮蔽和忽视的重要维度,而是重新实现了与传播层面的连结。正如尼古拉斯·盖恩和戴维·比尔所述,“移动界面”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并协调着信息权利结构,重构着日常生活实践,并改变着身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④。并且藉由“移动界面”,这种身体与传播的连结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携带“移动界面”的社会个体之身体被嵌入至物理空间中,展开实体化的日常社会交往;另一方面,携带“移动界面”的社会个体之身体又即时性地穿梭在虚拟技术所构筑起的“信息世界”之中,展开实时地、虚拟在场地交往与互动。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层面之间并非完全隔绝,而是不断地以身体作为“交互界面”形成交汇。^⑤此外,“移动界面”在另外一个层面还赋予了社会个体之身体在传播意义层面上的自由度和自主性。换言之,“移动界面”使得每个社会个体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支配自己的身体,并实现与社会的连结、沟通和交往。正如有学者所言,“近年来数字移动媒体的出现,更是将移动性与自由和自主挂起钩来”^⑥。

最后,从工具层、主体层和关系层三者间的耦合来看,移动性在其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前所述,“移动界面”本身对时空关系的重组和超越,使得社会个体之身体在移动过程中与传播始终能够不分离地联系在一起。在此基础上,社会个体可以借由“移动界面”这一技术工具在空间移动过程中实现更好地、更自主地社会交往。正如Silva所言,“移动界面”日益影响着“我们对于所居住的空间的认知,以及我们可能与其他人开展的交流方式”^⑦。此外,当下以剧烈的城市化进程为主要表征的现代化要求社会个体处在不断移动和空间流动之中,这也意味着社会发展制度性地授予了社会个体自由支

① 蒋晓丽、赵唯阳:《后互联网时代传媒时空观的嬗变与融合》,《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1期。

② 蒋晓丽、赵唯阳:《后互联网时代传媒时空观的嬗变与融合》。

③ 孙玮:《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

④ [美]尼古拉斯·盖恩、[英]戴维·比尔:《新媒介:关键概念》,第62页。

⑤ 孙玮:《赛博人: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

⑥ 孙玮:《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

⑦ A. D. S. E. Silva, “From cyber to hybrid mobile technologies as interfaces of hybrid space”.

配自己身体的权利。在身体重获解放后,使得社会个体有着更强烈的社会交往需求,这种需求的实现又需要社会个体通过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和工具来达成。这时,基于移动媒介的“移动界面”成为了社会个体在移动中随时随地展开社会联结的重要工具。要言之,在移动性逻辑的统合下,一方面,“移动界面”实现了身体与传播重新联结的可能性和超时空性;另一方面,“移动界面”和身体的连结,不仅重构了我们身处的环境和空间形态,而且进一步成为了社会和文化活力的“交汇处”,影响了更大意义上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互动过程。

四、结语

毋庸置疑,移动网络技术正在开启人类社会的崭新状态,体现在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空间层面,同样正在发生颠覆性的变革:物理与虚拟空间之间的界限愈加难辨,由此形塑的“复合空间”已成为理解和把握移动网络时代媒介化社会空间的关键概念。从表面上看,“复合空间”是基于媒介技术积极地构筑和营造下的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互嵌、共构与融合的产物,然而实际上,它的生成背后却存在着更为复杂交错的内在逻辑。因此,这也成为了本研究的逻辑起点。

最终通过研究发现,“复合空间”并非简单由技术建构的、仅涵括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不断融合的社会现实,而是基于“工具/移动界面”、“主体/身体(‘人机复合体’)”、“关系/社会交往”三个“层级/要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在此基础上,三者通过移动性这一关联逻辑耦合起来,处于立体的、动态的、不可分割的相互连结之中,最终构成作为有机整体的“复合空间”。如前所述,作为理解和把握移动网络时代媒介化社会空间的关键概念,“复合空间”不仅为我们更好地审视和考察移动网络时代下媒介技术、行动主体及其所展开的新型社会交往三者间的互构与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同时也为移动传播研究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分析进路。从此意义而言,关于这一话题,在未来将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and 探讨。

(责任编辑:程天君)

Hierarchical Elements of “Hybrid Space” Formation and Their Coupling Logic in the Era of Mobile Network

JIANG Xiaoli, ZHU Yaxi

Abstract: At present, “hybrid space” has become a key term for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mediated social space in the era of mobile networks. Howeve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uses it more as a descriptive concept, and there is little exploration of the inner logic behind its formation.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at “hybrid space” is not a social reality that is simply constructed by technology and encompasses only the continuous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space and virtual space, but an outcome based on three “levels/elements”: i.e. “tool/mobile interface”; “subject/body (‘human-machine complex’)”; and “relationship/social interaction”. On this basis, these three “levels/elements” are coupled together by the logic of mobility, in a three-dimensional, dynamic, indivisible interconnection, and ultimately constitute a “hybrid space” as an organic whole.

Key words: mobile networks; hybrid space; mobile interface; human-machine complex; social interaction

About the authors: JIANG Xiaoli, PhD in literature, is Professor at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ZHU Yaxi is PhD Candidate at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